

《訓民正音》語文政策與韓國文字之崛起

蔣為文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漢字文化圈的成員包含台灣、越南、韓國、日本、新加坡及中國等。這些國家在引進漢字一段時間後均發生漢字文言文無法充分表記當地語言的問題。為了解決漢字文言文的不良問題，當地逐漸發展出新的文字系統。韓國目前使用的韓文即源自十五世紀世宗大王發明的諺文。在二十世紀前，諺文仍被視為低俗的文字，直到1948年韓國獨立才讓韓文獲得官方正式語文的地位。隨著諺文被「逆轉勝」後，韓國人開始對外行銷諺文。韓國政府於1989年起出資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宗大王文字讀寫獎」以紀念世宗大王發明諺文。韓國政府更進一步將當初世宗大王公布使用諺文的《訓民正音》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功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韓國是漢字文化圈內成功廢除漢字並恢復本土語言文字的案例之一。本論文將深入探討韓國從漢字文言文轉換成韓國文字的過程及其對台灣的啟示。

關鍵詞：韓文、朝鮮文、諺文、音素文字、韓國、訓民正音

壹、前言

漢字的發源地始於中國。隨著秦始皇統一文字及後來漢、唐的文化盛世，漢字亦逐漸傳播到週遭國家（周有光，2003）。這些國家引進漢字後採用《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等漢文古籍為教科書，甚至引進「科舉制度」，因而對當地社會文化產生不小影響而形成所謂的「漢字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的成員包含台灣、越南、韓國、朝鮮、日本、新加坡及中國等。這些國家在引進漢字一段時間後均發生漢字文言文無法充分表記當地語言的問題。為了解決漢字文言文的不良問題，當地逐漸發展出新的文字系統，譬如越南的「字喃」(chữ Nôm)及「越南羅馬字」(chữ Quốc ngữ)，韓國與朝鮮的「諺文」(Hangul)，日本的「假名」(Kana)及台灣的「歌仔冊文字」與「白話字」(Peh-oē-jī)。儘管各地發展出在地的本土文字，然而在絕大多數時間下漢字才是主流文字，並形成「高低文字」(digraphia)的現象（蔣為文，2007：331）。在高低文字的現象中，漢字文言文被視為「高文字」，具有官方正統地位且使用於正式場合。相形之下，各地的本土文字則被視為粗俗、沒水準的「低文字」，僅能在有限的非正式場合勉強使用。這種現象一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段及二十世紀前半段左右才有巨大的轉變。

首先對漢字正統地位提出挑戰的是日本。日本於 1868 年明治維新後為有效翻譯來自西歐國家的新事物與新概念，對語文改革議題相當注重。隨著日本語文改革的進行，假名的地位亦從「女書」的地位翻身成為與漢字平起平坐的正式文字（Seeley, 1991）。

完全廢除漢字並改用羅馬字的首推越南。越南雖然利用漢字衍生發展出字喃，可惜字喃比漢字難讀難寫，因而難以推廣。最後越南政府於 1945 年決定廢除漢字與字喃，改採用十七世紀已傳到越南的教會羅馬字為正式的越南文字（蔣為文，2002）。

「大韓民國」(以下簡稱南韓)官方目前使用的正式文字自稱為「한글」(韓文; Hangul);「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北韓)的正式文字自稱為「조선글」(朝鮮文; Chosengul)或「조선자」(朝鮮字; Chosoncha)。不論韓文或朝鮮文,均源自十五世紀世宗大王所發明的「諺文」(언문; Onmun)(本論文以諺文統稱韓文及朝鮮文)。「諺文」一詞在台灣並無負面的意思,然而在韓語裡諺文有負面的、粗俗的文字的意思(Taylor & Taylor, 1995: 212)。因此不論在南韓或北韓,均不使用諺文此詞。目前韓國使用的 Hangul 一詞具有「完美的文字」的意思,是朝鮮語文研究兼推動者「周時經」(Chu Si-gyong)於1910年開始使用(Kim-Renaud, 1997: 1-2)。

雖然韓文與朝鮮文源自十五世紀的諺文,但不代表諺文從十五世紀起即成為正式文字。在二十世紀前,諺文仍被視為低文字。這種情形直到日本統治朝鮮半島時期才有重大轉變。日本統治時期,朝鮮民族主義者為鼓吹民主與獨立運動,開始思考如何以民眾容易入手的工具進行思想傳播與國民教育。在此思維下,恢復與提升諺文地位最後成為民族運動的首要工作之一。隨著民族運動的推廣,諺文的地位與民眾接受度也隨著提高。二次大戰後,隨著韓國與朝鮮的獨立,諺文終於取代漢字的地位而成為官方主要正式文字。韓國並訂定每年十月九日為韓文節國定假日¹。這幾年,諺文也隨著韓國商品行銷到全世界,成為二十一世紀受全球矚目的新興文字之一。

隨著諺文被「逆轉勝」後,韓國人開始對外行銷諺文。韓國政府於1989年起出資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宗大王文字讀寫獎」(UNESCO King Sejong Literacy Prize²)以紀念世宗大王發明諺文。韓

¹ 韓文節始於1926年由朝鮮語學會為了紀念發明諺文480周年而設立。韓國從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後,韓文節被指定為國定節日之一。1990年,由於雇主抱怨節日過多而將韓文節降為紀念日。直到2005年韓文節重新復原為國定節日。

² 詳細資訊,請見其官方網頁<<http://www.unesco.org/en/literacy/literacy-prizes/the-unesco-king-sejong-literacy-prize/>>。

國政府更進一步將當初世宗大王公布使用諺文的《訓民正音》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並於1997年10月獲准。

Anderson (1991: 37-46) 曾分析「出版」、「宗教改革」與「當地母語的出頭」是近代西歐民族國家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Davies (1997: 482) 也指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用民族母語來創作的風氣導致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的發展；而這也是形成國家認同的關鍵之一」。韓國是漢字文化圈內成功廢除漢字並恢復本土語言文字的案例之一。本論文將從社會語言學及脫漢運動的角度深入探討韓國從漢字文言文轉換成韓國文字的過程及其對台灣的啓示。

貳、韓語的文字傳統與語言結構

公元前 108 年，中國漢武帝征服古朝鮮，設立「樂浪」、「真番」、「臨屯」與「玄菟」四郡。大約公元三、四世紀漢字傳入古朝鮮並在當地的文人階級當中使用。公元四世紀，住在鴨綠江南北一帶的「高句麗」人攻佔樂浪郡，結束來自中國的直接統治，朝鮮半島相繼形成「高句麗」(Koguryo)、「百濟」(Paekche) 與「新羅」(Shilla) 三個王國相互鼎力。雖然朝鮮半島脫離中國統治，大體上仍是漢式制度。公元 668 年，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積極模仿唐朝制度。接下來的「高麗王朝」(918-1392) 更確立科舉制度，中國的經書變做朝鮮人必修的課程，漢字的正統地位也穩固起來 (Nahm, 1993: 25-43; Taylor & Taylor, 1995: 203-204)。

二十世紀前，漢字在東亞的使用情形與地位就如同中古歐洲時期各西歐國家均使用拉丁文為共通語文一般 (Norman, 1988: 83)。漢字文言文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書面語言，不僅與漢語口語不同，與朝鮮語／韓語、越南語、日語等中國週遭國家的語言更是差異甚大。因此，漢字與文言文傳入古朝鮮的初期被古朝鮮人當作完全不同於朝鮮語的外國語文來使用。由於差異太大，造成識字率低且無法充分表記古朝鮮語的語音與語法特色。

漢語與越語、台語同為 SVO 類型的孤立語，但韓語與日語則為 SOV 類型的膠著語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Sohn, 1999: 15)。SVO 詞序的句子會依照「主詞」+「動詞」+「受詞」的順序排序。SOV 類型的句子則把動詞放在句尾，形成「主詞」+「受詞」+「動詞」的順序。所謂膠著語是指在詞根添加多種詞綴 (affix) 來表示語詞型態變化。亦即透過添加詞綴可以區分主詞、受詞或語詞語意的改變等。

由於古朝鮮語與漢語實為不同的語言，在使用漢字文言文一段不短的期間後，古朝鮮人開始嘗試將漢字當作純粹的文字符號並利用它來紀錄古朝鮮人的口語。「鄉札」(Hyangch'al) 與「吏讀」(Idu) 這二種漢字式的古朝鮮語書寫法於是產生。

鄉札大約出現於公元六世紀末、七世紀初，結束朝鮮李朝 (1392-1897) 初期，主要用來紀錄當時的「鄉歌」(意即民間歌謠) (Ledyard, 1966: 33-34, 42)。鄉札出現的時代背景與表記方式類似於日本的《萬葉集》或台灣的歌仔冊³。流傳至今的鄉歌僅剩 25 首，分別收錄在《三國遺事》(14 首) 及《均如傳》(11 首) 裡 (Ledyard, 1966: 36; 趙潤濟, 1992: 30)。以下摘錄新羅時代具代表性的鄉歌作品〈處容歌〉供讀者參考：

〈處容歌〉原文

東京明期月良，夜入伊遊行如可

入良沙寢矣見昆，脚烏伊四是良羅

二盼隱吾下於叱古，二盼隱誰支下焉古

本矣吾下是如馬於隱，奪叱良乙何如為理古

〈處容歌〉中譯版 (鄭錫元, 2009)

在首爾明亮的月色下，一直遊到深夜。

回到家裡往床上一看，居然四條腿。

兩條是我的，另兩條是誰的呢？

原本是我的，現在被搶走了，這可怎麼辦呢？

³ 關於鄉札與萬葉集的漢字表記方式，請參閱李鍾徹 (1983)。

吏讀亦被稱為「吏道」(Ido)、「吏頭」(Idu)或「吏吐」(It'o) (Ledyard, 1966: 50)。吏讀有不同的寫法可能因為它尚未完全標準化，就如同越南的字喃因未標準化故也有許多異體字。相對於鄉札用來紀錄鄉歌，吏讀主要用來紀錄官方文書、人名、地名及學習漢字文言文的輔助工具(Sohn, 1999: 124; Ledyard, 1966: 50)。吏讀大約與鄉札起源於同時期，但延續使用到約十九世紀末(Taylor & Taylor, 1995: 206)。一般而言，吏讀與鄉札的區分主要在書寫內容而非文字用法上的差異。

不論吏讀或鄉札，都不能用既有的漢字文言文讀法來解讀。在吏讀或鄉札的寫法裡，均將漢字當做音節標音(所謂的表音)或音節詞素(所謂表意)的文字符號來使用。一般來說，實詞採用漢字的原意，虛詞則不論漢字原意、僅借其音來表記，如例1所示：

- 1a. (文言文) 父婦有別
 1b. (吏讀) 父婦隱有別為古
 1c. (漢字+諺文) 父婦는有別하고

參、世宗大王與《訓民正音》

李世宗(1397-1450)為朝鮮王朝李朝第四代國王，在位三十二年。李世宗任內有許多功績與發明，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發明字母式的文字系統「諺文」(King Seijong Memorial Society, 1970: 11)。

諺文是一種二維排列的音素文字(蔣為文, 2007: 387)。世宗大王公布的諺文計有二十八個基本字母。因為歷史音變的關係，當代的韓文字母僅用二十四個字母。這些字母符號均對應一個韓語的「音素」(phoneme)，透過音素字母的排列組合再構成音節(Shin, Lee, & Lee, 1990)。由於受到漢字二維排列方式的影響，故諺文亦採用上下左右二維的排列方式，而非英文式的一維線性排列。譬如，韓國字「한」是由三個音素符號「ㅎ」、「ㅏ」、「ㄴ」拼湊而成，如下圖所示。

表 1 以「한」為例的韓國諺文文字結構

ㅎ	+	ㅏ	+	ㄴ	→	한
[h]		[a]		[n]		[han]

由於漢字文言文純粹為外國語文，而鄉札與吏讀因依附在漢字之上，故民眾識字率不高。為解決這些問題，世宗大王於是召集學者進行新文字系統的研發。這套文字於 1443 年設計完成，稍後李世宗於 1446 年頒布《訓民正音》正式使用諺文 (Lee, 1957 : 3 ; Shin, Lee, & Lee, 1990)。《訓民正音》分別有漢字文言文版及漢字與諺文對照版。《訓民正音》裡談到為何創作諺文：

國之語音 異乎中國 與文字不相流通 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 予為此憫然 新制二十八字 欲使人人易習 便於日用矣……有其聲而無其字 假中國之字以通其用 是猶柄鑿之鉏鋤也 豈能達而無礙乎 要皆各隨所處而安 不可強之使同也 吾東方禮樂文章 倖擬華夏 但方言俚語 不與之同 學書者患其有趣之難曉 治獄者病其曲折之難通 昔新羅薛驄 始作吏讀 官府民間 至今行之 然皆假字而用 或澀或窒 非但鄙陋無稽而已 至於言語之間 則不能達其萬一焉…… (Lee, 1957)

雖然世宗大王有意推行諺文，然而朝廷內那些擁有漢字既得利益的士大夫階級卻多數不願配合。譬如，1444 年 2 月，李朝的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帶頭以漢字文言文上疏反對世宗推行諺文（全文請見附件一）：

(1) 我朝自祖宗以來 至誠事大 一遵華制 今當同文同軌之時 創作諺文 有該觀聽 儻曰諺文 皆本古字非新字也 則字形雖倣古之篆文 用音合字盡反於古 實無所據 若流中國 或有非議者 豈不有愧於事大慕華

(2) 自古九州之內 風土雖異 未有因方言而別為文字者 雖蒙古西夏 女真日本西蕃之類 各有其字 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 傳曰用憂 變夷 未聞變於夷者也 歷代中國皆以我國箕子遺風 文物禮樂 比擬中華 今別作諺文 捨中國自同於夷狄 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 取蟪蛄之丸也 豈非文明之大累哉 (Lee, 1957: 30)

世宗大王以一國之尊欲推行諺文仍遭遇到士大夫階級的反對，可見當時高低文字的嚴重對立。那些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因為掌握漢字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因為把中國當作宗主國的大中華意識的影響，導致不顧國內普羅大眾的教育權而進行文字讀寫能力的壟斷。世宗大王為降低士大夫階級對諺文的敵意，一方面對外宣稱諺文僅是漢字的輔助工具，一方面以諺文創作及翻譯古籍以證明諺文的可行性。《龍飛御天歌》即是第一部使用漢字及諺文創作的文學試驗品（趙潤濟，1992：118）。雖然世宗大王有意推行諺文，可惜公布《訓民正音》四年後即去世。

世宗去世後，燕山君（1476-1506）在位的時期（1494-1506）因為有人用諺文撰寫黑函來批評他的執政，他就利用這個機會下令禁止使用諺文。由於懂漢字的士大夫階級看不起諺文，將諺文鄙視為粗俗的文字，因而有志於當官的男人均不屑學習。在諺文出現後的幾百年裡，它主要僅在婦女與僧侶之間流傳使用，故諺文亦稱為「女書」或者「僧字」。這種情形一直到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朝鮮半島的民族意識強烈提升才開始改變。

肆、近代的語文運動

朝鮮半島於十六世紀末相繼遭受日本與滿州的侵略破壞後，朝鮮王朝決定採取鎖國的政策。隨著西歐國家殖民主義在亞洲的拓展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逐漸形成，朝鮮王朝於十九世紀中期面臨了空前的亡國危機（Shin, 2000: 14）。1876年在日本的壓力之下朝鮮王朝重新開放門戶（Lee, 1965: 19）。隨之而來的一連串外辱事件及日本於1910年正式將朝鮮王朝納入殖民統治，均促使朝鮮王朝人民興起以朝鮮為國家認同的近代民族主義運動。

爲平息東學農民運動之怒，朝鮮王朝高宗國王於 1894 年至 1896 年間推動甲午改革，以進行教育、社會、行政體系及經濟各方面的革新。採用長達千年的傳統「科舉制度」，終於於 1894 年廢除。此外，高宗又頒布命令規定「法律條文與公文基本上應採用諺文；但全漢字或漢字與諺文混用的版本於必要時可以增加」(Taylor & Taylor, 1995: 259; Lee, 2000: 43)。

由於東學運動之後續影響，造成清國與日本爲爭奪對朝鮮王朝的宗主權而於 1894 年 7 月爆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後，高宗不再承認清國對朝鮮王朝的宗主權，且於 1896 年宣告獨立並改國名爲「大韓帝國」。1904 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趁勢脅迫日、韓於 1905 年簽定『乙巳保護條約』，意圖於大韓帝國建立傀儡政權。高宗國王由於不願配合日本的保護政策，於 1907 被迫退位。1910 年，日本進一步迫使韓國簽定『韓日合併條約』，大韓帝國終究淪爲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統治朝鮮半島期間的教育是以基本職業訓練爲主(Taylor & Taylor, 1995: 260)。1911 年 8 月，日本統治者發布《朝鮮教育令》，將培養朝鮮人具有日本國民精神和普及日本語作爲其教育目的(鄭錫元，2009)。日本統治朝鮮半島及台灣時於初期均以包容舊慣的方式，某種程度地容許當地風俗、習慣與語言的存在。但到了 1937 年，爲了強化對日本天皇的忠誠與準備對中國侵略，日本統治者開始進行去本土的皇民化運動。譬如，1938 年起學校禁用朝鮮文，1940 年起要求朝鮮人使用日本姓氏(Taylor & Taylor, 1995: 261)。此外，日本統治者於 1939 年操作成立「朝鮮文人協會」以遂行朝鮮文壇日語化的工作(趙潤濟，1992: 610-12)。

儘管日本統治下的朝鮮語文發展環境不佳，在「周時經」(1876-1916)與金科奉(1889-1960)等人的推動下，朝鮮語文的近代化與標準化工作也逐步奠基起來。周時經不僅投身政治運動，對朝鮮語的現代語言學研究也有很大的貢獻，重要著作有《國語文典音學》(1908)、《國語文法》(1910)、《語音》(1914)等。周時經於朝鮮語文扮演的角色類似王育德對台灣語文的貢獻。

那群熱愛朝鮮語文的民族主義運動者於 1921 年成立「朝鮮語研究會 4」，打算做朝鮮語文的標準化與推廣工作。該組織於 1933 年發表《墜字法統一案》，1936 年發表《標準語詞彙集》並出版會刊《國語》，1940 年發表《外來語標記法》。由於「朝鮮語學會」推動朝鮮語文及朝鮮意識的活動被日本統治者認定為與鼓吹朝鮮獨立有關，於是在 1942 年製造所謂的「朝鮮語學會事件」，逮捕該會會員以打擊朝鮮語文運動（鄭錫元，2009）。

1945 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朝鮮半島於 1948 年分別成立「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南、北韓分別獨立後，立即廢除日文、改用民族語文，總算給了朝鮮語文出頭天的機會。為有利國民教育及展現民族自信與自尊，北韓於 1949 廢除漢字 5、完全採用諺文為官方正式語文。南韓對於是否保留漢字始終存在爭議（鄭錫元，2009；Lee, 2000: 51）。但不論主張為何，以諺文為主的民族價值觀卻不因人而異。以下摘要南韓關於使用韓文或漢字的年代發展過程（Taylor & Taylor, 1995: 209-10）：

- 1948 首任總統李承晚公布命令所有政府公文須用韓文書寫，但必要時可以暫時增列漢文於旁。
- 1950 為限制漢字數量，教育部公布 1,200 個日常用漢字及 1,000 個學校教學用漢字。
- 1955 教育部公布命令所有日常報紙、雜誌、書籍等均和政府公文一樣須採用韓文書寫，但源自漢字的專有名詞得以在韓文後面增列漢字原文。
- 1968 總統朴正熙公布廢漢字的五年計畫，隨後又改為二年計畫。
- 1970 漢字完全從政府公文及學校教育裡消失。
- 1972 教育部規劃 1,800 個漢字作為教育用途。

⁴ 1931 年改名為「朝鮮語學會」。

⁵ 北韓於 1960 年代曾於學校恢復基本漢字的教學，但書寫時仍只用諺文。

1975 容許中學教育的教科書出現漢字。

1991 高等法院允許 2,854 個漢字作為個人的姓名。

儘管廢漢字的爭議不斷，漢字在韓國的使用比率與地位均已明顯下降。韓國學者 Yi Sok-chu（引用在 Taylor and Taylor, 1995: 208）曾根據《朝鮮日報》歷年來的用字計算出漢字比率的下降情形，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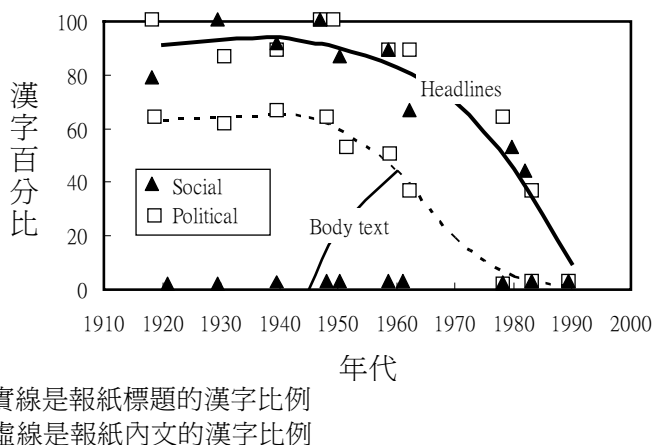


圖 1 《朝鮮日報》歷年來使用漢字的比率變化

伍、結語

韓國在使用漢字近二千年後能夠成功轉換成韓文，可歸因於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的時機成熟。所謂外部因素是指韓國與漢字起源地中國的關係變化。內部因素是指國內的反封建、反知識壟斷的大眾需求。

知名的文字學家 Gelb (1952: 196) 曾指出「在所有文字改革成功案例中可發現，都是外國人才敢推翻文字傳統、建立新的書寫系統」。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即身陷外國列強欺侮之泥沼中而無法再有力控制週遭的藩屬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剛好是亞洲民族主義意識高漲的時期。韓國在脫離日本統治後當然不可能走回頭路重建傳統的封建王朝。既然不用再

承認漢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自然可以不受束縛地進行語文改革並採用韓文作為建構大韓民族的語文基礎。

就文字讀寫的角度來說，韓文比漢字、吏讀來得容易學習，因為音素文字通常只需要少數的字母就可以描寫某個語言的所有語音(Smalley, 1963: 7; DeFrancis, 1996; Chiung, 2003)。為推廣國民教育以建設現代的民族國家，韓文當然成了執政者的首選。

隨著韓國電視劇與電子產品的崛起，韓國語文也成為各國許多人競相學習的語文之一。韓文能成為新興的國際語文之一，並不是偶然形成的。除了有客觀的經濟實力之外，還要有主觀的推動意願。相形之下，台灣雖然也有經濟實力，可惜台商與台灣政府卻沒有意識到推廣台灣語文的重要性與必要性。1945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後，原本有機會讓本土的台灣語文出頭，卻因中華民國的統治及華語政策的實施，讓本土語言陷入滅絕的危機。自稱本土政黨的民進黨，於執政期間（2000-2008）卻沒有勇氣向韓國一樣宣布恢復使用台灣語文。即使不敢廢除漢字、華語，至少也要台灣語文與華語文並存！可惜，連這樣的思維也沒有。從韓國復興韓文的例子可得到啟發：加強台灣人對台灣語文的母語忠誠度，及推行非漢字式的台文書寫方式是凸顯台灣文化主體性與民族意識的重要課題之一。

附件一：「崔萬里」上疏反對世宗推行諺文之全文

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等上疏曰 臣等伏觀 諺文制作 至為神妙 創物運智 實出千古 然而以臣等區區管見 尚有可疑者敢布危懇 謹疏于後 伏惟 聖裁

- (1) 我朝自祖宗以來 至誠事大 一遵華制 今當同文同軌之時 創作諺文 有該觀聽 儻曰諺文 皆本古字非新字也 則字形雖倣古之篆文 用音合字盡反於古 實無所據 若流中國 或有非議者 豈不有愧於事大慕華
- (2) 自古九州之內 風土雖異 未有因方言而別為文字者 雖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類 各有其字 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 傳曰用憂變夷 未聞變於夷者也 歷代中國皆以我國箕子遺風 文物禮樂比擬中華 今別作諺文 捨中國自同於夷狄 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取蟾蜍之丸也 豈非文明之大累哉
- (3) 新羅薛聰吏讀 雖謂鄙俚 然皆借中國通用之字 施於語助 與文字元不相離 故雖至胥吏僕隸之徒 必欲習之 先讀教書 粗知文字 然後乃用吏讀 用吏讀者 須憑文字 乃能達意 故因吏讀而知文字者頗多 亦與學之助也 若我國元不知文字 如結繩之世 則如借諺文 以資一時之用 猶可 而執正義者 必曰 與其行諺文以姑息 不若寧遲緩而習中國通用之文字 以為長久之計也 而況吏讀行之數千年 而簿書期會等事 無有防礙者 何用改舊 行無弊之文 別創鄙諺無益之字乎若行諺文 則為吏者 尊習諺文 不顧學問 文字吏昌歧而為二 苟為吏者 以諺文而宦達 則後進皆見其如此也 以為二十七字諺文 足以立身於世 何須苦心勞思 窮性理之學哉 如此則數十年之後 知文字者必少 雖能以諺文而施於吏事 不知聖賢之文字 則不學牆面 昧於事理之是非 徒工於諺文 將何用哉 我國家積累右文之化 恐漸至掃地矣 前此吏讀雖不外於文字 有識者尚且鄙之 思欲以吏文易之 而況諺文與文

字暫不干涉 專用委巷俚語者乎 借使諺文 自前朝有之 以今日文明之治 變魯至道之意 尚肯因循而襲之乎 必有更張之議者 此灼然可知之理也 厭舊喜新 古今通患 今此諺文不過新奇一藝耳 於學有損 於治無益 反覆籌之 未見其可也

(4) 若曰如刑殺獄辭 以吏讀文字書之 則不知文理之愚民 一字之差 容或致冤 今以諺文直書其言 讀使聽之 則雖至愚之人 悉皆易曉 而無抱屈者 然自古中國言與文同 獄訟之間 冤枉甚多 借以我國言之 獄囚之解吏讀者 親讀招辭知其誣而不勝極楚 多有枉服者 是非不知招辭之文意 而被冤也明矣 若然則雖用諺文 何異於此 是知刑獄平不平 在於獄吏之如何 而不在言與文之同不同也 欲以諺文平獄辭 臣等未見其可也

(5) 凡立事功 不貴近速 國家比來措置 皆務速成 恐非為治之體 儻曰諺文不得已而為之 此變易風俗之大者 當謀及宰相 下至百僚 國人皆曰可 猶先甲先庚 更加三思 質諸帝王而不悖 考諸中而無愧 百世以俟聖人而惑 然後乃可行也 今不博採群議 驟令吏輩十餘人訓習 又輕改古人已成之韻書 附會無稽之諺文 聚工匠數十人刻之 刻欲廣布 其於天下後世 公議何如 且今清州椒之幸 特慮年歉 扈從諸事 務從簡約 比之前日 十減八九 至於啟達公務 亦委政府 若夫諺文非國家緩急不得已及期之事 何獨於行在而汲汲為之 以煩聖躬調燮之時乎 臣等未見其可也

(6) 先儒云 凡百玩好 皆奪志 至於書札 於儒者事最近 然一向好著 亦自喪志 今東宮雖德性成就 猶當潛心聖學 益求其未至 諺文縱曰有益 特文士六藝之一耳 況萬萬無一利於治道 而乃研精費思 竟日移時 實有損於時敏之學也

臣等 俱以文墨末技 待罪侍從 心有所懷 不敢含默 謹鑿肺腑 仰瀆聖聰 (Lee, 1957: 30)

參考文獻

- 李鍾徹。1983。《鄉歌斗萬葉集歌斗表記法比較研究》。首爾：集文堂。
- 周有光。2003。《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 趙潤濟（張璉瑰譯）。1992。《韓國文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蔣爲文。2002。〈越南的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語言政策〉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649-77頁。台北：前衛出版社。
- 蔣爲文。2007。《語言、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台南：成功大學。
- 鄭錫元。2009。〈韓國語文政策與漢字〉發表於玄奘大學主辦「華語文與華文化教育國際研討會」。新竹：玄奘大學。12月11-12日。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 New York: Verso.
- Chung, Wi-vun T. 2003. "Learning Efficiencies for Different Orthograph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Roman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Davies, Norman. 1997.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Pimlico.
- DeFrancis, John. 1996. "How Efficient Is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Visible Language*, Vol. 30, No. 1, pp. 6-44.
- Gelb, I. J. 1952. *A Study of Writing: The Foundations of Grammat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m-Renaud, Young-key. 1997. *The Korean Alpha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King Seijong Memorial Society. 1970. *King Seijong the Great: A Biography of Korea's most famous King*. Seoul: King Seijong Memorial Society.
- Ledyard, Gari Keit. 1966. "The Korean Language Reform of 1446: The Origin, Background,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Korean Alphabe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Lee, Chong-sik. 1965. *The Politics of Korean Na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Jeongyi. 2000. *A Model of Writing Variety: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 Korean Writing Varietie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Lee, Sang-Beck. 1957. *The Origin of the Korean Alphabet Hangul*. Seoul: Tong-Mun Kwan.
- Nahm, Andrew C. 1993. *Introduction to Korean History and Culture*. Seoul: Hollym Corporation.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eley, Christopher. 1991. *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 Leiden: E. J. Brill.
- Shin, Sang-Soon, Don-Ju Lee, and Hwan-Mook Lee. 1990. *Understanding Hunmin-jong.um*.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 Shin, Yong-ha. 2000. *Modern Korean History and Nationalism*. Seoul: Jimoondang Publishing Co.
- Smalley, William. 1963. *Orthography Studies: Articles on New Writing Systems*. Lond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 Sohn, Ho-Min. 1999. *The Korean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Insup, and Martin Taylor. 1995.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unmin-jong.um Language Policy and Emergence of Korean Hangul

Wi-vun Taiffalo Chi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Abstract

The Han character sphere, including Taiwan, Vietnam, Korea, Japan, Singapore and China, adopted Han characters and classical Han writing as the official written language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the adven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rought along great changes. In Korea, Han characters were finally replaced by Korean Hangul after World War II. Hangul is a phonemic writing system invented by King Sejo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lthough Hangul was invented by King, it was regarded as a vulgar writing after King Sejong's death. The vulgar status of Hangul was not changed until 1948 when the Korean people achieved independence. The Korean government adopts Hangul as the official writing system.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its effort to promote Hangu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the UNESCO King Sejong Literacy Prize was established in 1989 to commemorate King Sejong. In short, Korea is one of the cases to replace Han characters with phonemic writing system in Asia. This paper examines Korean orthographic transition in terms of literacy and nationalism. The survey reveals th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Hangul.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general public's demand for literacy and anti-feudal hierarchy.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Keywords: Korean, Chosengul, Hangul, phonemic writing, Korea, Hunmin-jong.um